

# 西部民族地区 农牧区科学发展

## 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XIBU MINZUDIQU

NONGMUQU KEXUEFAZHAN

YU SHEHUIXINXIHA FAZHANZHANLUE YANJIU

文兴吾 何翼扬 著



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ZD025）

# 西部民族地区 农牧区科学发展 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XIBU MINZUDIQU  
NONGMUQUREXUEFAZHAN  
YU SHIXI TONGXIFU FAZHANZHANLUE YANJIU

文兴吾 何翼扬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冯瑶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张 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文兴吾,何翼扬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01-015463-3

I. ①西… II. ①文…②何… III. ①信息技术-应用-民族  
地区-农村-西北地区-研究②信息技术-应用-民族地区-  
农村-西南地区-研究 IV. ①F3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1901 号

###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XIBU MINZUDIQU NONGMUQU KEXUEFAZHAN YU

SHEHUIXINXIHA FAZHANZHANLÜE YANJIU

文兴吾 何翼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875

字数:346 千字

ISBN 978-7-01-015463-3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前言 |

2006—2010年，我们主持主研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以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牧区）研究”；该项研究出版了专著《以信息技术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2010年11月，我们申报的“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课题，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10AZD025）。本书是“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书名“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反映了该项研究触发的两个基本问题与研究成果的基本内涵，也显示出研究的基本思想逻辑、精神实质及心路历程。

### （一）

从系统工程方法论看，“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课题的立项，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的科学实践价值是必然的。系统工程方法逻辑维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定义问题或明确问题，它包括两件事：其一，查明一种需要；其二，查明达到这种需要的环境条件和可行条件。前者

叫做需要研究；后者叫做环境研究，包括技术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研究、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研究。2011年初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第一篇是“转变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其中在阐述“指导思想”时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很显然，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下，“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是与“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紧密相关的。于是，一个基本问题被提出来，这就是：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沃尔特·罗斯托在研究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阶段和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了突破经济停滞状态，发展中国家必须摆脱拉格纳·纳克斯所说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困境，或者如哈维·莱宾斯坦所说的用“最小临界努力”突破落后经济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罗斯托把用“最小临界努力”摆脱“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称之为经济起飞过程。罗斯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分别是：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群众性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指出，“起飞”的突破过程是关键性的，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一当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罗斯托的理论联系起来，不难看到：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地

发展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其一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落后地区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而实现“经济起飞”（没有“经济起飞”也就无所谓“经济增长”）。其二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已实现“经济起飞”的地区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很显然，对于绝大多数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而言，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推进科学发展，当属第一种情况。在这样的思维行程中，明确“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明确“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成为了本项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

从思想逻辑上讲，“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只是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努力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手段。一般而言，人们都把信息化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发展后的享受；而本项研究提出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把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作为贫困农牧区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与“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的“第一推动”，或者说，是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不能缺失的重要一环。这种思想，既基于深刻认识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障碍；也基于把握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重大成果与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态势，及其对解决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问题提供的重大机遇。它可以说是总结历史作出的新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把握当代信息科技革命以及信息社会建设的全球大趋势而作出的“社会工程”设计。

## (二)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的大中城市；境内现有的城镇人口少、规模小，多是以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存在，在经济上对周边经济发展的带动性甚微。另一方面，受高原、山地、荒漠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土地承载能力较为低下，人们居住的空间极为分散，从而造成其在整体上远离大中城市的同时，在其内部又远离交通干道和中心城镇，形成对外对内的双向封闭格局。由此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农牧民销售农牧产品和购买现代生产要素的运输费用，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其产出和投入的商品化，阻止了其农牧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由于信息闭塞，同时受不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禁忌的影响，导致并强化了传统文化的封闭和思想观念的守旧，形成了特定的“封闭区域、封闭文化、封闭经济和封闭人口”特征；不少贫困农牧区为“贫困文化”所笼罩。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经济上合理的生活模式将遭到最严重的内在困境；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有赖于合理的技术与法律，而且取决于人们所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态度与倾向。

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是辩证统一的。长期以来，民族地区都面对着“发展和如何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一方面是发展不足的贫穷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方式不当的掠夺性的粗放型开发方式问题。后果表现为森林过伐，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沙化，物种减少，自然灾害加剧，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推进“社会—经济

—生态”协调发展。只有推进“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才可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和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才能走上富裕的道路，实现富于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与传统发展观念的区别在于：从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即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从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非物质资源或信息资源（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

人类实践活动可分为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媒介的侧面。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理论与实践的许多研究都表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知识发展差距，根源在于信息贫困与交往活动贫乏。当代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创造的信息传播体系，提供了空前的、低成本的传播知识和交流知识的现代手段，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有助于破除狭隘地域性观念，有助于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为落后地区通过消除信息贫困、增强交往活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人类肢体、器官的延伸，技术绝不仅仅意味着某种手段或工具性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学意蕴；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每一种新技术的引入，都要求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每一种新的技术都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向新型感知和活动领域的大门，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导致人的观念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长期处于落后的技术状态，人的

发展也就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改变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的落后状态，就必须要有新技术能流的有效进入。

现代信息技术既是促进生产的技术，也是促进交往的技术。“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是以加强社会交往技术为基点，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各阶层民众发展；在运用信息技术加强社会交往中形成社会分工，形成以知识引导发展的机制，进而使“促进生产的信息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在这个“外生技术”逐步与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生产与生活方式融合中，通过人的技术化，最终将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性的丰富与发展。这是一个以新要素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由此不断推进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求发展的过程。例如，国家广泛建设乡、村信息服务站，而乡、村信息服务站点的发展需要多层次、多样性的信息化综合应用科技人才，这就率先为大中专毕业生提供了以知识服务本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父老乡亲的舞台。继之，随着信息能流、技术能流与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独具特色的生态、生物、文化资源相结合，农牧业、生态民族文化旅游业以生态化、产业化、工业化方式发展，效益不断提高；一当生态农牧业、生态民族文化旅游业呈现出良好的收益之时，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才将纷纷参与其间：经商办企业，发展家庭农场和家庭牧场，走向专业化、商品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使知识和经济的发展实现统一。而“人才兴农”、“人才兴牧”的成就，则将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使教育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激励优秀青年自觉地、积极地投身于建设自己的家乡，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事业，成为特色经济中的特色人才。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由此进入良性循环，外部的投资和

技术也将不断涌人。在这个由传统的农牧业走向专业化、商品化的现代农牧业的过程中，不断降低人的劳动强度、提高自然环境资源使用效率的“促进生产的信息技术”将得到广泛运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既可能有本土的企业修建公路，也可能有外部的企业修建公路；无论是出于特色农牧产品的销售需要，还是出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又如，政府向广大农牧民普遍赠送广播电视接收终端，使每一个农牧民家庭中有了一套现代文明设施，有了一套帮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设施。一当农牧民从珍惜它、爱护它到广泛运用它，也就走出了与现代文明接轨的重要一步；家庭生产、生活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都将大大增加，文明形态将逐步发生深刻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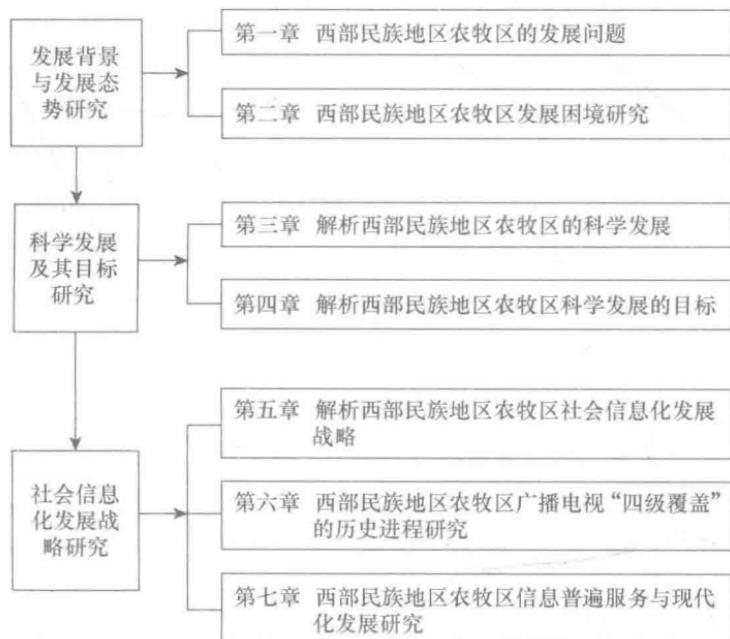
应该明确，社会信息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信息化是指与国民经济信息化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信息化；而广义的社会信息化作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发展的信息化模式”，指的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信息技术和信息方法来开发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并以此为手段来开发和利用物质资源和能源，从而不断地把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水平推向新的高度，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贯穿了“社会发展优先”的理念，在坚持广义的社会信息化理念基础上，把狭义的社会信息化，即社会领域的信息化，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通过率先推进信息技术在西部农牧区社会交往领域的广泛运用，加强政府的社会服务和丰富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唤起农牧民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而走向幸福生活的热望，由此走出“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经济社会起飞。这是一

种从“文化性社会工程创新”、“调控性社会工程创新”入手，进而实现“生产性社会工程创新”的发展机制。本书对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进行了谋划，阐明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及其处理、操作策略。

### (三)

本书由三个板块共七章构成，基本框架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书的基本框架结构



本书的创新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以“世界眼光”和“机遇意识”建构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的科学发展，强调“顶层设计”，明确提出了西部民族

地区农牧区依靠当代科技进步的（综合）现代化发展问题。近些年，学术界对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扶贫开发研究的著述较多，一般都集中在中观和微观层面，而缺乏进行“顶层设计”的理论建构，缺乏让扶贫工作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谋划，缺乏对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谋划。然而，一如江泽民同志在 1999 年就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现代化发展，理应是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的正题。我国正处于历史巨变时期，中国的学者不能陷入西方社会学否定所谓“宏大叙事”，只注重中层、微观研究的理论误区，我们的研究更要关注那些具有方向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的使用，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理性理所当然地构成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基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工程理念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知识，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在当代国际国内大环境中实现经济社会起飞，实现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应该是当前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第二，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一个基本问题：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并对其进行了有系统、较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西部农牧区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充分依靠科技进步、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客观必然性与紧迫性，阐明了“生活型社会”应是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推进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分析了“世界进入知

识经济时代”对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提供的全新契机。

第三，讨论了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包括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确认、正确处理信息技术的战略应用与阶段性策略的辩证关系、以“卫星覆盖”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信息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可行性、实施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的主体确认，尤其阐明了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实施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战略，基于“全国一盘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并且，运用马克思的技术及交往理论揭示了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哲学意义，明确了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生活型社会”建设的内在一致性。

第四，通过把握中国农村广播电视业的多次历史性飞跃，把握历史发展进程中奠定的技术、制度、资源基础，提出了直接依托“中星9号”直播卫星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广播电视“四级全覆盖”的构想；其间综合运用了卫星数据广播与数据分发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幼平“基于播存原理的文化网格”理论等相关知识。依托“中星9号”直播卫星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广播电视“四级全覆盖”的构想，是对“直播卫星+地面微波”这一国家当前推行的对我国有线电视不能通达的农村地区提供广播电视“四级全覆盖”公共服务方式的创新。它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对国家既有资源（“中星9号”直播卫星及其闲置转发器）的分析和创新性运用，既能节省对广袤的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进行市、县广播电视节目覆盖而修建地面微波传输线路和发射

台站所需要投入的巨额经费，以及日后的运行、维护所需要投入的巨额经费，又能大大节约建设时间和实现更安全、更稳定的运行服务。可以用“省力省事”、“费省效宏”来概括。

第五，提出基于我国卫星通信事业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信息普遍服务“三步走”通达方案，包括：基于中国西部农村网络卫视建设工程的信息普遍服务体系建设；伴随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系统（CMMB）发展深化信息普遍服务（用便携式终端、手持机等接收到广播电视节目，接收的天线不再是“小锅”，而是10厘米左右的拉竿天线。这对于远离居住地放牧的牧民，对于田间劳作的农民听广播，意义尤其重大）；利用不断进步的卫星通信技术（尤其是通过我国自己的低轨道移动通信卫星的发展）解决“电话普及”问题。

第六，阐明了当前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美国知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本特征是“以能源转型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一次新产业革命，即生态产业革命；指出“以能源转型推动生态工业发展的生态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新能源分布式发电的普遍运用”思想与创意——对于人口分散、地处偏僻、生态脆弱、发展落后的西部农牧区推进现代化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通过明确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普遍运用”对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可望争取国家给予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普遍运用”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扶持。

第七，阐明了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实施“中国西部农村网络卫视建设工程”与“中国西部农村光伏发电普及工程”及其辩证统一关系，它们统一于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战略。没有充足的电力，社会信息化发展就缺乏现实的技术和物质基础；

因此，大力实施“中国西部农村光伏发电普及工程”是必需的。而没有广播、电视等信息的普遍服务，缺乏地方政府和科技人员的指导，光伏发电等先进技术也就很难在居住分散、交通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有效地推广运用；因此，大力实施“中国西部农村网络卫视建设工程”也是必需的。实施“中国西部农村网络卫视建设工程”与实施“中国西部农村光伏发电普及工程”的统一，将使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告别传统的、低效率的农牧社会，消除贫困，过上幸福美好的现代生活；它们是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现代化发展的奠基性工程。

第八，把哲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交叉融会，把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综合应用，把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与社会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互补协同，把复杂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解析得通俗易懂，视野较开阔、说理较充分、论证较透彻；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密切结合，取得的成果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本项研究明确提出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依靠当代科技进步的综合现代化发展问题，必然触及到如何看待科技进步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并对“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断进行否定。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未发表争鸣文章。本项研究正视矛盾，解决矛盾：一方面，在《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21—25页）一文中揭示了俞吾金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

义叙述体系”的批判是不合理的，存在不少违反科学研究基本规范的行为。另一方面，在《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动力观》（《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48—52页）一文中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坚持的“科学技术动力观”进行了有系统的论述，阐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的丰富与发展。由此，既为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充分依靠当代科技进步推进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拉开了国内学术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的改变问题”争论的帷幕；成为本项研究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之一。

本项研究已发表的论文还有：《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基本问题研究》（《农村经济》2013年第1期）、《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第3期）、《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文化变革：生活型社会建设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11期），以及《文化兴国：加强科技文化普及工作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6期）、《加强科技文化普及能力建设研究》（《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论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1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与生态文明》（《成都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此外，《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与农牧区科学发展研究》一文被收录入《民族走廊——互动、融合与发展》（论文集），2015年1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时间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政治承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的深刻含义，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全面建成，这也反映了我国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时代。二是必须全面确保全国各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充分体现了把 13 亿多人全部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本项研究对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重大问题的讨论，对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通过把握中国农村广播电视台历史发展进程中奠定的技术、制度、资源基础，提出的直接依托“中星 9 号”直播卫星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广播电视台“四级全覆盖”的构想，以及基于我国卫星通信事业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信息普遍服务“三步走”通达方案，可以为公共服务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规划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十三五”发展提供参考。

坚执“以知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信念，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已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限于水平，本书肯定有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及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2015 年 6 月